

主持人语

当今的世界由数百个主权国家组成,其中绝大多数像中国一样是多民族国家。在这一现代的世界体系中,中国在民族和文化上的“多元一体”性,无论对内还是对外都意味深长。

近年来,围绕中国的多民族性讨论文学和文化已成为中外学界的一个焦点。学者们从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及比较文学与文化批评等多学科和多视角展开论述,发表了一系列令人关注的成果,有的论述如“多民族文学史观”还引起了热烈回应和论争。

为了从学理与实践结合的层面推动多民族国家的文学、文化研究,我们与《百色学院学报》编辑部合作的专栏将继续展开相关讨论,内容包括“多民族国家”、“文学史观”、“文学教育”及“书面与口传”、“中国和世界”和“访谈与对话”等多个方面,约请不同学科、不同地区和民族以及不同年龄的学者参与,把该项研究引向深入。

本期文章由不同类型组成。笔者的《多民族文学研究的历史意义》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开题报告的缩写版,主要从历史脉络与当代背景相结合的角度阐述了研究多民族文学的重要意义。北京大学陈跃红教授的访谈围绕中国高校的文学教育背景,追寻了多民族文学如何在大学课堂呈现的话题。本期组织翻译了一篇讨论文学与族群叙事关系的文章。作者艾琳·温勒以在美国的移民为例,具体阐述了斯洛文尼亚民族文化如何经由文学而“被表述”。作者认为,文本透露出的有关民族文化的人类学信息,只能通过间接方式获取,除非这些信息是在作品纯现实的章节中呈现。李国太把我们的视线引回历史,剖析一份“不该遗忘的民国杂志”,刊行于20世纪40年代成都的《风土什志》。该杂志除了介绍人文地理及地理知识、收集各方风土人情资料外,不乏对本土多种民族“作详确广泛的调查报告”。作者认为《风土什志》主编李劫人当年创办风俗期刊对于中国民俗学和民族文学的发展“功不可没”,我更觉得后人从敬重出发的“重写历史”同样可贵。郭茜的文章介绍侗族作家潘年英的另一类写作——关于少数民族的图像叙事,分析在当代中国的多元结构中,少数民族如何以“他者”形象被呈现。

总之,无论追问大学的多民族文学教育还是关注少数民族图像叙事、回望以往的风俗呈现史或是关注族群叙事中的表述与被表述,这些多样化的视角都有助于我们拓展胸怀,将目光从以往单一的“纯文学”文本的框架里解放出来,关注多民族文学表述中同样具有影响力的图像叙事、考察报告及其他更多类型。

徐新建

多民族文学研究的历史意义^①

徐新建

(四川大学 文新学院,四川成都 610064)

摘要: 现代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现代中国的文学也是多元互补的多民族文学。文章

*收稿日期: 2013-02-10

**基金项目: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共同发展研究”(批准号:11ZD&104)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徐新建(1955~),男,贵州贵阳人,四川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人类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①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共同发展研究”开题报告的缩写版(项目号:11&ZD104)。报告于2011年底提交,笔者根据同行专家的意见做了修订,特此说明并致谢意。

结合历史脉络及当代背景阐述研究多民族文学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多民族文学；少数民族；不同而和

中图分类号：I2-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33(2013)02-0050-03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Multi-Ethnic Literature Study

XU Xinjian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4)

Abstract: Modern China is a unified multi-ethnic country. Literature of modern China is made of multi-ethnic literatures which are diverse and complementary. This paper will, by tracing the history of multi-ethnic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exploring its modern background, expound the significance of research.

Key words: multi-ethnic literature; minority groups; different but harmonious

现代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共同体。国家颁布的《宪法》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确立，并将继续加强。”（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1982年12月4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告公布施行。）

从数千年的历史演变看，自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执政党对“民族团结”政策的强调，使得夷夏并存的多民族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融洽互补。国家领导人的号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①这不但体现了新政权在民族观念与民族政策的整体观和一致性，亦反映出对旧中国“民族对立”模式的突破和超越。旧中国的民族对立模式，以近代为例，就是大清帝国声称的“五族共和”及中华民国宣扬的“中华同源”。前者以满、汉、蒙、回、藏划分排列，在政治权力上凸显和固化民族等级；后者以中华同源同宗说为基础，否认非汉民族的存在，在文化认同上推行民族消亡论。这样的状况即如新中国建立后以政府名义发布的《白皮书》指出的那样：“中国历代政府虽都有一套关于民族事务的政策和制度，但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建立的中央政权，民族间无平等可言。”^{[1](P98)}

新中国“民族团结”的基本国策在20世纪50年代结下显著成果，各族人民平等相处，互补共进，在物

质和精神上都取得了较为均衡的改进。这一局面在遭到“文革”十年动荡破坏之后，又在20世纪80年代的“新时期”重新复苏。“改革开放”以来，作为现代多民族国家内的各族群体，在民族意识、民族身份、民族文化及民族关系等方面，都出现了朝向“多元一体”、“不同而和”再次迈进的新趋势。

然而，由于经济开发浪潮及国际局势等因素的冲击，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日益加大，民族间的某些观念信仰和文化水准发生碰撞，加上社会上对多民族国家在经济大潮下涌现的民族问题认识不一，有的处理失误，致使近年来中国的多元族群关系出现了一些不利于和谐共处的端倪。

面对这样的历史背景，作为族群互动和国家表征之组成部分的多民族文学具有重要的文化和政治意义。一方面，经由多民族文学的构成与实践，可了解和认知民族关系的深层根基；另一方面，通过文学表述与文学教育，亦可形塑国家形象的整体构成及各族之间的身份认同和相互尊重，也就是借助有利于民族团结的文学措施，调动文学艺术对由各族民众组成的全体公民的凝聚力量，朝着宪法指明的目标——继续加强“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迈进。

遗憾的是，作为多民族国家巨大财富的多民族文学，在以往漫长的王朝岁月里，不是受到观念上的否定就是遭到实践中的排斥。直到20世纪初的“新文

^① 新中国建立之初，执政的共产党为民族问题制定了基本路线。毛泽东号召：“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毛的号召以亲笔题词的方式向全国发布，通过层层传达和组织学习，产生了广泛影响。参见降边嘉措：《民族大团结从此开始——记毛主席书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题词的经过》，《中国民族》2000年第6期。相关论述可参见笔者论文《民间仪式与作家书写的双重并轨——从“普洱誓盟”看现代中国的“民族表述”》，《民族文学研究》2011年第4期。

化运动”后,在一批批现代学者努力下,随着民族学、史学和文学、人类学界对“五族共和”的扬弃、对“俗文学运动”及“歌谣运动”等被誉为“眼光向下之革命”的发动和参与,国人对于中国多民族文学意义和价值的认知,才逐渐改观。^①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政府对民族文学的共建和发展高度重视,不但在作协系统内设立少数民族文学机构和团体,还创办了专门的《民族文学》期刊以及后来的民族文学研究所。国家发动和组织一轮又一轮的队伍,深入各地和各族的乡村基层、牧区草地,收集整理并出版了多种类型的民族民间文学资料,举办不同形式的文学讲习班,发掘、培养出一批后来在社会上产生重要影响的各族作家。正如玛拉沁夫和吉狄马加在题为《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的文章所指出的那样,到跨入21世纪之际,不但全中国55个少数民族都有了自己的作家,其中加入中国作协的已超过600人,占了全体作协会员的11.1%。^②

由于帝国王朝时期残留的“中原中心”观、“大汉族主义”以及族群“孤立主义”^③等影响,尤其是十年“文革”对新中国基本国策的严重破坏,致使新中国期待创建的“民族团结”目标,未能在多民族文学领域全然实现。现今流行的数千种中国文学史,大多还停留在过度突出中原汉民族的汉语文学叙述上,文学教育——无论学校还是社会、也无论书面印刷的精英文学还是民间流传的口头传统、抑或是现代出现的电子游戏和网络书写,均没有完整体现与多民族国家之总体文学面貌相符合的深度和效果。正如马学良先生多年前就曾指出过的一样:

我们生存在多民族的国家中,很多人不知跟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国家中有些什么民族。不说一般人,就连有些大学生也不甚了了,更谈不上对少数民族文学的了解了。大学文科的文学课程设置,不乏古今中外的文学课,唯独没有少数民族文学这类课程……因而有的少数民族学者为此啧有烦言,认为大学的中国文学系,既曰中国文学,就应当包括五十几个少数民族

的文学,否则就改名汉族文学系。^{[2](序)}

马学良所言的这种后果不但影响到文学领域的各民族团结互助、平等共进,而且还使得本应对多民族国家之国民认同发挥积极作用的多民族文学表述——包括创作、评论、文学史构建及全社会的文学教育失去了正面和充分参与的时代良机。

事实上早在1958年,作家老舍(满族)在为中作协理事会做的《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里就已指出:“我国早已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长期相处与交往中,创造了我们整个祖国历史与文化。在文学方面也是如此。我们各少数民族文学是祖国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3]40多年后,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乐黛云在《读书》杂志发表专文,又强调了研究中国各民族文学的意义。她指出:

(包含)五十多个民族的少数民族比较文学研究会不仅在中国独一无二,就是在全世界恐怕也是绝无仅有。我们正处于一个世界性的文化转型时期。在这种历史阶段,文化的横向开拓比一般的纵向发展显得更突出。所谓横向开拓,就是一种民族文化向他种民族文化借鉴,主流文化向边缘文化靠拢,一门学科向他种学科寻求渗透等。在这种情况下,曾经处于边缘地位的少数民族文化无疑将对主流文化的更新起很大的刺激作用。^[4]

在这些前辈学者的倡导、努力下经过新时期以来的“改革开放”推动,学界对多民族文学的价值和意义在认识和实践上再次发生了重大转变。其中,相关平台有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与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会等。前者由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与四川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及广西民族大学、青海民族大学和新疆大学、内蒙古赤峰学院等多家机构和高校相关单位共同发起和主办。后者的前身是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所属的二级机构“中国少数民族比较文学分会”。其他的相关团体与学术平台还有“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④以及由国内多家学术团体共同组建的“中国少

① 相关论述可参阅笔者的论著《民歌与国学:民国早期“歌谣运动”的回顾与思考》,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

② 参见玛拉沁夫、吉狄马加:《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经典文库总序》,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③ 此处的族群“孤立主义”主要指在不同民族和文化间否认彼此联系以至于导致相互诋毁排斥的主张和倾向。这种倾向否定跨族群的多元整体存在,不承认民族交往的历史事实和文化意义,因而与“华夏中心论”等偏见一样,同样不利于“不同而和”的民族共生。不过用族群“孤立主义”而不是“地方主义”,是要突出彼此间的横向对等,而不是后者体现的纵向等级。

④ 中国少数民族比较文学分会与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都是隶属于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二级学会。2011年末,在总会支持批准下,以两个分会为基础又拓展成立了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会,将中国的多民族文学研究推向了新阶段。

数民族文学学会”等。它们的存在为各族学者彼此交流和平等对话提供了重要的学术空间,同时对从学理层面广泛深入的关注和研究中国多民族文学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

自2007年后,由《民族文学研究》杂志领头,在国内发起创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大讨论。2010年,“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在广西桂林举办专题会议,讨论有关中国的多民族文学教育问题,进一步把关注的视野拓展到新的场域。在此进程中,各族学者纷纷参与,面对现状,提出问题,有共识也有论争,有分歧更有共同关怀——那就是希望通过对多民族文学的研讨,平等对话、冷静思考,既总结历史、参与现实,更展望未来、创建明天,期待走向多民族国家在民族问题上的和谐共处新时代。

如今,以全球化进程中的跨文化对话为背景,参照国外多民族国家的文学境况,我们若要更为深入和理性地评说多民族国家的各民族文学价值和意义,就应寻求一个更为全面的解释框架。就中国的情况来说,可行的方式之一是从多元史观的角度出发,把握

多民族国家的内外关系,突破以往二元对立的模式,把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一道置于作为总体的“中国文学”中加以审视,从而形成全面的认识整体并由此获得对汉与非汉民族文学的新体认,简言之,即研讨并确立全面系统的“多民族文学史观”,以使目前的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走向完善。

参考文献:

-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白皮书[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 马学良,梁庭望,张公瑾.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M]. 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
- [3] 老舍. 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A]. 玛拉沁夫,狄马加主编.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经典文库[C].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
- [4] 乐黛云. 多民族文化研究的广阔前景[J]. 读书,1993,(12).

【责任编辑:黄玲】

简讯:

“文学人类学与多民族文化研究中心”在广西民族大学成立

2012年11月,在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和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会等团体的协助下,跨学科学术平台“文学人类学与多民族文化研究中心”在广西民族大学成立。中心成立之际举办了题为“多学科视野下的中国多民族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学术讨论。

中国社科院的汤晓青和四川大学的徐新建教授应邀做了题为《现代学术格局中的民族文学研究》和《创建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的理论话语》的演讲。

汤晓青回顾了少数民族文学的搜集、整理和研究现状,强调民族文学研究者在注重个人学术手段和理论话语更新的同时,要从多民族文学的比较和综合研究入手,不断强化中华民族文学的有机整体性研究。

徐新建阐述了“多民族文学”这一范畴的学术意义,继而通过对民族观念及文学史书写的历史梳理,提出要把握时机、在继承既有成果基础上,创建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的理论话语。

同年12月12日,“文学人类学与多民族文化研究中心”在广西民族大学中文系正式挂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叶舒宪教授莅临现场为中心揭牌。随后,叶教授做了《历史记忆与四重证据法》的学术讲座,提出“N级编码理论”。这是叶舒宪教授继其所提出的“神话历史”、“四重证据法”、“大、小传统”理论之后,又一个新的理论创建。

广西民族大学“文学人类学与多民族文化研究中心”的创立,得到了国内相关学生团体的支持与参与,无疑为中国多民族文学的跨学科和跨地域交流合作增添新的平台,我们期待该中心推出具有民族与地域特色的厚重成果。

(马卫华)